

# 輯刊 研究 文學 古典

曾永義  
主編

出版  
文化出版社  
花木蘭

十三編 第 6 冊

## 明代四大奇書之 續書文化敘事研究 (下)

林景隆 著



#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十三編

曾永義主編

第6冊

明代四大奇書之續書文化敘事研究(下)

林景隆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明代四大奇書之續書文化敘事研究（下）／林景隆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6〔民 105〕

目 4+178 面；19×26 公分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十三編；第 6 冊）

ISBN 978-986-404-582-2（精裝）

1. 明代文學 2. 敘事文學 3. 文學評論

820.8

105002162

ISBN-978-986-404-582-2



9 789864 045822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十三編 第六冊

ISBN：978-986-404-582-2

---

明代四大奇書之續書文化敘事研究（下）

---

作 者 林景隆

主 編 曾永義

總編輯 杜潔祥

副總編輯 楊嘉樂

編 輯 許郁翎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社 長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hml810518@gmail.com](mailto:hml810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6 年 3 月

全書字數 329207 字

定 價 十三編 20 冊（精裝）新台幣 38,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明代四大奇書之續書文化敘事研究(下)

林景隆 著



# 目

# 次

## 上 冊

第一章 緒 論	1
第一節 邁向重寫經典之路	4
一、成書：作者與版本	5
二、編創：在承襲仿擬與踵事增華之間	9
三、類型：在依傍史傳與人情寫實之間	10
四、主題：在制約與偏離之間	11
第二節 文獻探討	13
第三節 釋題：問題意識與研究進路	25
一、問題意識	26
二、研究進路	29
第四節 研究方法	31
第二章 史統散而小說興：明代四大奇書之續書的 話語內蘊	33
第一節 敘事傳統的接受與偏離	34
一、講史傳統的延續	35
二、主題先行的敘事開端	43
第二節 世變書寫下的敘事創造	52
一、歷史與虛構的再現	53
二、由個人至家國的倫理秩序	65

第三章 讀者視域：四大奇書之續書的閱讀反應	77
第一節 書寫情志的主體實踐	79
一、文本與序跋所呈現的自我意識	80
二、文本與序跋所呈現的創作動機	87
第二節 主題傳釋的變異	95
一、《三國演義》及其續書虛構之差異	96
二、《水滸傳》及其續書詮釋之差異	99
三、《西遊記》及其續書心性修煉的闡釋	107
四、《金瓶梅》及其續書之道德色彩	115
第三節 敘事形式的模仿與翻案	123
一、回目的設置	125
二、說話人敘述方式	126
三、修辭模式	131
第四章 世俗歸趣：四大奇書之續書的儒家本位與宗教意識	141
第一節 在儒家倫理與宗教話語之間	143
一、《三國演義》續書的政治興替	145
二、《水滸傳》續書的忠義／盜賊敘事	150
三、《西遊記》續書的心性修煉	164
四、《金瓶梅》續書的勸善心態	175
第二節 小說中的宗教敘事框架	181
一、轉世框架	184
二、夢幻框架	190
三、度脫框架	192
四、嫡派框架	195
五、還陽框架	199
下 冊	
第五章 經世致用：四大奇書之續書的政治圖景	203
第一節 政治寓言的創造與個人抉擇	206
一、戰爭敘事下的忠佞之辨	207
二、亂世情境下的英雄想像	215
三、神魔鬥法中的救世寓言	221
第二節 儒家政治理想的通俗闡釋	225
一、平天下	225
二、治國	228

三、修身	234
四、齊家	244
第三節 歷史與道德的統一	249
一、忠義敘事的變奏	250
二、世情書寫的變調	260
第六章 天命人事：四大奇書之續書的歷史意識	265
第一節 天道循環的運行與反思	267
一、天命移轉的歷史詮釋	268
二、藉神道設教的天命架構	271
第二節 個體命運的張揚與寄寓	277
一、天命主導下的個人追求	279
二、個人命運變化的觀照	285
第三節 歷劫試煉的救贖與昇華	290
一、招安前後的意識轉變	291
二、模式化的取經考驗	296
第七章 小說演義：明代四大奇書之續書的創作實踐	303
第一節 明清「演義」觀念的生成	306
一、「演義」與「歷史演義」之義界	307
二、「演義」的思想命題與創作譜系	310
三、演義之外的「不協調音」	315
第二節 演義觀念的容受	323
一、創作本體的認知	324
二、創作觀念的深化	328
第三節 重寫觀點下的文本實踐	336
一、《三國演義》續書引史為證	337
二、《水滸傳》續書重寫俠義的歷史轉向	339
三、《西遊記》續書聖與凡的「新詮」	344
四、《金瓶梅》續書的權威敘事與道德擺盪	352
第八章 結 論	357
第一節 文化轉向：經典轉化與讀者詮釋	359
第二節 話語實踐：創作認知與歷史回應	363
參考文獻	369

## 第五章 經世致用：四大奇書之續書的政治圖景

以「重寫」的角度考察明代四大奇書之續書對原書既有的題材框架與主題寓意的改寫，在在都顯現出特殊的歷史意識及政治思維，從中也可分析原書人物在續書編創過程中，對於四大奇書寫定者，在小說文本中所建構的「世變」的歷史背景，當中人物在考驗、誘惑、抉擇等敘事過程中，針對特定現實的敘事命題，是如何產生「鑑往知來」的經驗法則，而續書在吸取這些敘事法則的過程中，是如何在個人、家庭乃至國家中尋求一平衡點，並對四大奇書所蘊含的「經世致用」思想做出文學／歷史的回應，是本章所力求釐清的重點所在。

明代四大奇書之續書的作者，在原書出版所帶來龐大商業利益的驅使下，依傍史傳的敘事傳統及原書書寫筆法的承襲，都對續書編創發揮了極大的影響力，做為文學經典的異質重現，如何「翻新出奇」成為續書編創的首要課題，「但是，就有意識的商業策劃而言，經典重現毫無疑問意味著對經典意義的轉換、再生和稀釋，它在消費社會時代同經典的名言挪用、意境挪用一道，構成了一種商業擴張的大趨勢。」〔註1〕而續書除了顧及商業娛樂的現實考量外，在敘事動機方面承襲四大奇書「道德教化」的意識形態，並且較

---

〔註1〕吳興明：〈從消費關係座架看文學經典的商業擴張〉，收入童慶炳、陶東風主編：《文學經典的建構、解構和重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11月第1版），頁230。

奇書文體更進一步面向世俗讀者進行經典的通俗闡釋，而道德教化的意識形態，則是建立在宋元說話伎藝中「講史」的基礎上，講史活動強調講史者本身參考《資治通鑑》或《通鑑綱目》等史料文獻進行演史的事實，而面向世俗百姓為講史者的營生之道，講史做為一種民間敘事藝術，一方面除了「采諸史傳，另一方面則是以民間傳說為基礎，其思想意趣也和民間傳說保持一致，只有這樣才能被廣大聽眾所認可。」〔註2〕到了《三國志通俗演義》的出版之後，寫定者採取「七實三虛」的敘事筆法，關於歷史與虛構的問題才逐漸被評論家所注意。

在「演義」的話語實踐中，續書作者較之四大奇書的寫定者，在虛實互滲的話語構成中，採用更加貼近讀者大眾的通俗敘事模式，傳達特定的歷史意識，體現出中國傳統「儒家倫理」為本位的敘事動機，卻也在宗教敘事面向上呈現多元的框架，四大奇書之續書在思維模式及接受反應的文學／文化交流過程中，彼此存在內在系譜上的共相聯繫，透過第一回所建置的預敘性敘事框架，傳達作者轉化、再生、稀釋經典意義的敘事意圖，表現出續書作者個人特殊的思想型態，在「講史」的基礎上，四大奇書之續書與孔子作《春秋》所奠定的史學精神與政治理念，在敘事脈絡上有著一脈相承的聯繫關係，並且朝向更加通俗易懂的教化層次邁進。

續書中的通俗敘事常用因果報應、天人感應的敘事框架，傳達作者對現實不滿的創作心理，同樣承襲自明代四大奇書的勸懲教化的敘事觀念，其中「最突出的典型自然是做為誨淫之代表的《金瓶梅》和做為強盜教科書的《水滸傳》。然而這種反道德問題並沒有給敘述人造成困擾，就是因為在誨淫誨盜的故事內容背後存在著深層敘事結構的道德指向：無論多麼壞的事，發展的最終結果都將是符合道德的。」〔註3〕而考察《水滸傳》、《金瓶梅》等續書在原書道德命題的討論所呈現的多元樣貌也是本章節欲著力的重點之一，如《水滸後傳》中的燕青可謂智勇雙全，作者陳忱對他青睞有加，在其〈水滸後傳論略〉曾論曰：

燕青忠其主，敏於事，絕其技，全於害，似有大學問、大經濟。

〔註2〕樓含松：《從「講史」到「演義」——中國古代通俗小說的歷史敘事》，（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年7月第1版），頁162。

〔註3〕高小康：《中國古代敘事觀念與意識形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9月第1版），頁33～34。

堪作救時宰相，非梁山泊人物可以比擬也。其過人處，在勸主歸隱，黃柑面聖，竭力救盧二安人母子，木夾解關勝之患難，微言啓李俊之施恩，遇豔色而不動心，辭榮祿而甘隱遁，的是偉男子！

〔註4〕

陳忱在《水滸後傳》對燕青的性格形象有很大程度的補充及發揮，聚焦在此人物身上，也顯現作者陳忱在續書中有關「經世致用」的心理投射，除了小說人物形象寄寓的思想，亦有從佛教因果觀念統攝全書的《續金瓶梅》，西湖釣叟以為與原書《金瓶梅》同樣歸於「勸世」的主題思想，故而欲提升小說位階至「宗經翼聖」的文學地位，「烏知夫稗官野史足以翼聖宗經者，正如《雲門》、《韶》、《濩》，不遺夫擊壤鼓缶也。夫得道之精者，糟粕已具神理；得道之粗者，金石亦等瓦礫；顧人之眼力深淺耳。」〔註5〕也同樣是文人「經世」思想的反映。

四大奇書之續書在「經世致用」的意識作用下，呈現史筆文心的寫作樣貌，筆者擬由政治寓言的創造與個人抉擇、儒家政治理想的通俗闡釋、歷史與道德的統一等諸多觀察面向，並藉由沃爾夫岡·伊瑟爾（Wolfgang Iser）的「文本與讀者的反應」觀念審視四大奇書之續書敘事創造的意識形態內涵及其話語表現，四大奇書及其續書形成一種文學交流的結構，正是由於兩者不對稱的交流特點大大激發了續書建構的能動性，以沃爾夫岡·伊瑟爾（Wolfgang Iser）的話來說明：

否定與空白做為交流的基本組成部分因此成為能使結構（referential realities），促使決定過程得以實施，這個過程只有讀者才能具體實施。這使文本的意義蒙上了主觀色彩。然而由於文本不僅僅具有一個特定的意義，因而，表面看起來是缺陷的因素實際上是生產母體，它使文本能夠在各種隨歷史而變化的情境中具有意義。〔註6〕

透過文本與讀者的交流結構，續書群以明代四大奇書為參照，在否定與空白的衍生結構中，不斷擴充、複製儒家「經世致用」的生產性意義。

〔註4〕〔明〕樵餘：〈水滸後傳論略〉，見高玉海：《古代小說續書序跋釋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5月第1版），頁39。

〔註5〕〔清〕西湖釣叟：〈續金瓶梅集序〉，見高玉海：《古代小說續書序跋釋論》，頁128。

〔註6〕〔德〕沃爾夫岡·伊瑟爾（Wolfgang Iser）著，朱剛、谷婷婷、潘玉莎譯：《怎樣做理論》，（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10月第1版），頁79。

## 第一節 政治寓言的創造與個人抉擇

不論我們視明代四大奇書為歷史敘事還是文學敘事，都應該了解一個事實：即「進行這種話語活動的目的都不僅是傳達一個事件，而是要通過對一個或一系列事件的敘述和闡釋而表達某種意義。」〔註7〕基於這樣的歷史認知，其後的續書在敘事創造的「世變」情境中，往往加入政治寓言的話語指涉，對文學經典生產性意義的發揮產生不容忽視的影響，從明代《三國演義》出版後，象徵歷史演義的敘事範式已然成立，其後的歷史演義蔚為風潮，無不旁搜正史記載，結合知識娛樂與道德勸誡的雙重目的，試圖在「演義」的創作觀念下，發揮《春秋》等史書的「經世」理念，庸愚子在〈三國志通俗演義序〉對《春秋》道德垂訓的史家撰述意識有如下之體認：

夫史，非獨紀歷代之事，蓋欲昭往昔之盛衰，鑒君臣之善惡，載政事之得失，觀人才之吉凶，知邦家之休戚，以至寒暑災祥、褒貶予奪，無一而不筆之者，有義存焉。吾夫子因獲麟而作《春秋》。《春秋》，魯史也，孔子修之，至一字予者，褒之，否者，貶之。然一字之中，以見當時君臣父子之道，垂鑒後世，俾識某之善，某之惡，欲其勸懲警懼，不致有前車之覆。〔註8〕

如上所述，四大奇書敘事話語創造本身，即受到《春秋》一書「經世致用」思想的制約與影響，而四大奇書之續書，是否承襲《春秋》以來的史家撰述意識？以〈評刻水滸後傳敘〉為例說明：

顧言之：所貴者，上之則輔翼經傳，而聖道以明；次之則宣布王猷，而國家以治。彰善瘅惡，寓勸懲於紀載褒貶之中，使後人有所勸而樂於為善，有所懲而不敢為惡，務有裨於世道人心，非可苟焉而已也。〔註9〕

而天隱道人的〈續金瓶梅序〉也可為例證：即「作者曰：『予生平詩文，襲彩炫世，未有可以見閻羅老子。吾借小說作《感應篇》注，執贄於菩提王焉。知我者，其惟《春秋》乎？』」〔註10〕可見四大奇書之續書承襲《春秋》以降

〔註7〕高小康：《中國古代敘事觀念與意識形態》，頁17。

〔註8〕庸愚子：〈三國志通俗演義序〉，見黃霖、韓同文選注：《中國歷代小說論著選》（上），（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第3版），頁108。

〔註9〕〔清〕蔡元放：〈評刻水滸後傳敘〉，見高玉海：《古代小說續書序跋釋論》，頁48。

〔註10〕〔清〕天隱道人：〈續金瓶梅序〉，見高玉海：《古代小說續書序跋釋論》，頁

的史家「勸懲教化」的撰作意識，普遍上都具有「野史」的編創意識。

### 一、戰爭敘事下的忠佞之辨

在《三國演義》第一則〈祭天地桃園結義〉做為小說敘事的開端，寫定者即著重強調漢末政局紛亂情景，乃起於「後漢桓帝崩，靈帝即位，時年十二歲」，「中涓自此得權」，而在《續編三國志後傳》第一回〈後主降英雄避亂〉，作者西陽野史敘述蜀主劉禪因寵用宦官黃皓，此人「深恨姜維常欲除己」，故誤導後主錯估情勢，不增兵援助姜維，「又引巫師詐誕，以聾帝聽，以是帝遂不為設備，罷其預守之議」，而群臣也就不知姜維上表請兵之故，在魏軍長驅直入進逼之際，姜維與廖化、張翼共同扼守劍閣以拒鍾會所領之魏軍，透過戰爭敘事首先傳達出「亂自上作」的政治思維：

鍾會引兵攻打，被維出奇兵斷會糧道，前後身自挑戰凡數十合，互有勝敗。會亦慮糧運險遠，急未能得志，隨退兵安營相守。忽探得姜維有襲糧之兵出矣，會心甚懼，即欲退回長安，再圖後舉。鄧艾得知，以書抵會曰：「竊窺蜀國無能為也。蓋由宦官專權，忠良解體，縱一姜維之智，亦不能驅眾遠出，不過虛為聲勢以分我軍，彼得以逸待勞耳。……」（頁3）

同樣的居上位者，《三國演義》的靈帝與《續編三國志後傳》的蜀後主劉禪，都選擇了無所作為的政治決定，而禍亂之由皆起於君側之權臣，而在鄧艾引兵進入綿竹之後，後主大驚失措，「慌議出師，群臣無敢應諾者」更凸顯蜀國國勢將頹之敗象，諸葛瞻的諫言點出問題癥結：

諸葛瞻急入，大慟曰：「國家養兵育士，正在今日之用，何無一人應命？皆由陛下寵用黃皓，以至於此。今事已危急，臣雖不才，願拼微軀，上報陛下，下慰父心。」（頁6）

作者西陽野史欲藉由國勢衰頹不振，國主用人不當，群臣尸位素餐，彰顯諸葛瞻的「忠君事主」，而「天不佑漢人，其如何？」之悲憤可謂溢於言表，正當後主「計無所出」，「眾議紛紛不定」之際，受太史令譙周的建言所惑，後主竟有出降之意：

太史令譙周曰：「大將軍拒鍾會，其兵不可抽，抽則兩失。東吳非好相識，且艾兵已近郊，若知陛下出，縱輕騎追之，亦恐不能脫，皆

非善策耳。臣觀乾象，見國數已衰，賊氣方盛，客星犯闕，主星韜光，戰則無益，不如出降。上可救全城百姓之命，下可以保全九族，乃應天順時之舉，非臣不忠，敢陷陛下為屈膝事也。」後主惑其言，乃議出降。（頁6~7）

藉由天象之示警，來說明國勢將頹的局勢，有識之士深感「帝意不可轉，國事不可支」，「為今之計，唯有逃避退方，審機諒勢，或圖興復，此為上也。」蜀主劉禪既不可託，「明哲保身」的個人抉擇就成了時勢所趨，作者西陽野史透過楊龍之口，傳達出臣子面對時世變化時，對政治秩序及道德天命的重整所抱持的熱切寄託：

乃曰：「龍本不識時務之人，因思先父曾言諸葛丞相臨終，惟先父在側，囑以後事。言劉氏此復中衰，越三十年後，當有英主再出，復興漢業，重定中原。臣父對臣言之，謹記不忘，將謂國家尚有一統之日，不意事勢若此。主上惑於譙周之說，必不可移矣。臣觀七殿下相貌不凡，神異種種，將來主大器者，必殿下也。夫智者見於未萌，豈待已著乎？申生止而待死，重耳逃而復伯。此已往之明鑑也。吾輩願從殿下周游，萬死而不辭。」（頁7）

臣子面對世亂巨變之際，該如何自處？該如何抉擇？作者西陽野史在審視小說敘事的世變情境時，往往流露出「感時憂國」的歷史意識，也呈現儒家正統思想的政治情結，而這都是在中國傳統史學觀念影響下的書寫傳統，魯曉鵬認為：

首先，中國的歷史闡釋關注於文本的社會——歷史語境。它試圖展開歷史中特定人類活動的背景、起源及其背後的原因。它指向具體、特定、真實的歷史。儘管在歷史敘事中，人物和事件有時被讀作寓言或用一種用來表達某種更高真理的初級文本，但它們依然還是對歷史事件和人物真實可信的記錄。（註11）

作者西陽野史的立場可說是近官方的意識形態，並透過歷史敘事的闡釋，體現為一種帝王更迭與朝代變遷的「合法性」。第三回〈晉武帝興兵伐吳〉開頭敘述司馬炎如何即位稱帝的過程：

司馬炎竊父餘勢，專權擅政。見鄧艾、鍾會、姜維皆喪，遂有無君

〔註11〕 [美]魯曉鵬著，王瑋譯，馮雪峰校：《從史實性到虛構性：中國敘事詩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12月第1版），頁87。

之心。朝廷士大夫半皆其黨，魏主備位而已。賈充、衛瓘乃晉王心腹，日夕於帝前稱頌晉王功德，宜法堯禪舜，以協眾望。魏主見朝臣附司馬氏者多，威權又盛，恐遭所弑，乃於十二月禪位與晉王。（頁20）

藉由晉武帝逐步併吞三國，並進而顯現其政治野心，首先凸顯晉武帝「無君」之心，接著描寫吳主孫皓「刑爛法酷，朝野不安，上下離心」，結尾詩也埋下亡國伏筆，即：「吳氣將終晉氣驕，鱗鱗飛渡大江濤。眼前亡國多遺恨，迄此潮生怨未消。」第四回〈王渾王浚大爭功〉敘述晉武帝賜吳主皓為歸命侯，側寫當時吳國降將、晉驃騎將軍孫秀「因大悔向南流涕」的心理轉折：

其子孫會問之，秀曰：「昔信陵不歸故國，薛公笑之，乃趨駕還魏以破秦兵，千載之下，人皆仰其芳名。今吾避禍至此，羈身寄蹟，心實未忘本國。不意一朝吳國見亡，我心如割，不忍本宗淪沒，是以悲耳！雖然不能復取，俟其有隙，吾必陰以圖報司馬氏也。」（頁32）

在《續編三國志後傳》的歷史闡釋中，透過晉國併吞三國的戰爭敘事，作者西陽野史要讓世俗讀者了解，在三國解體的亂世時局中，知識份子的個人抉擇是如何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以及在整個歷史格局中如何發揮個人影響力，並藉由如亡國之臣諸葛靚逃避出仕的氣節，即：「亡國之臣既不能以身殉國，又不能匡救其主，反欲為偷生之計以求榮，此誠禽獸之幸耳，吾何為哉！」第五回〈郴嶺吳將敗晉兵〉，又以吳將陸晏、王毅的對話，傳達「忠臣不事二主」的政治理念：

次日，各來參謝陸晏，其佐二者上言曰：「倘吾吳國被破，晉軍以詔書來招，主帥等其將何以處之？」陸晏曰：「我等世食吳祿，主上雖涉過虐，未有大罪，世守江東，奉祀宗社。今晉無故興兵侵奪，心實恥之，縱雖國破，安肯受彼招安也？」王毅曰：「廣州公忠肝誠可貫天日矣。今國君降首，為臣子者叨受祿秩，豈可苟圖富貴，附仇以求榮乎？」陸晏又曰：「晉恃強必以兵馬來此威嚇，我等惟有戰耳！此易於處者。恐假吳主單騎持詔來此，則又難處矣。各宜整兵伺候。」（頁37）

面對國破家亡的歷史殘局，吳國將領選擇抵禦對抗，拒絕招安，《續編三國志後傳》中的戰爭敘事呈現的人心世態可謂立場鮮明，第四十回〈劉漢接位復

漢仇)對晉室八王之亂所引發的種種災異,在前一回末多所鋪陳,到了四十回作者藉劉聰再次強化晉國氣數將盡的諸多災異,即:「洛陽宮中鬼哭徹夜,金墉城內殺聲到曉,黃河水涸見底,銅駝夜走出城,太白當晝經天,中台輿轉如南極之分,城中土陷出鵝飛去天外,此皆晉數將脫之兆。」

《續編三國志後傳》以正史《晉書》與《資治通鑑》為基礎,吸取野史逸聞中合乎主題的材料予以加工,全書以蜀漢後裔劉淵、劉曜諸人出逃北地,聚兵興漢滅晉為敘事主軸,以西晉興國與東晉立國歷史為敘事時間貫穿而成,而劉淵欲得中州之地,方許從眾建位,右賢王劉宣曰:

「自我漢亡之後,地無尺寸可居,王侯降同編戶。今吾雖衰,眾猶不減數萬,奈何斂手受役,奄過百年乎?今元海英武超群,豐姿樣貌大類先主,劉玄明亦有天日之表、龍鳳之姿,天苟不欲興吾漢業,必不虛生此人也!況諸公悉皆卓犖之才、棟梁之器。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庫藏空乏,邊方各據,藩鎮自全,復吾漢家基業,正在此時,不可錯過。」(頁 304)

而在小說第九十四回〈漢破洛陽擄懷帝〉,敘述劉淵擄得懷帝,「自此以為得報仇恨,心滿意足,荒於酒色,淫戲無度,因而成病,日加沉重。」到了一百九回〈關姜罷斬准專權〉,敘述諸葛宣於進諫漢主劉聰,預告中原將成戰場之歷史變局:

宣於曰:「陛下問臣,臣才敢道。竊見太弟死而東宮壞,諫臣殺而延明瓦解,大將軍喪而西明門倒,太陰星殞而劉后兆妖身死,內史女化為男,是陰氣衰而陽氣長也。吾皇漢雖然包括二京,龍飛九五,但肇基山右,北朔陰氣之方,太陰現而氣衰,其應將在漢耳。今陛下日與後宮宴樂,將國家大政悉委於太子、靳准,太子雖素聰敏,迷惑於王沉等小人之流,泥於奸宄而傷殘骨肉忠正之士,使勳舊棄去,任信靳准。靳准兄弟豈是純良之臣?恃晏安而忽備御,殆不可也。且石勒鷗視趙魏,不聽宣召,有自霸之心;曹嶷狼顧全齊,不服調遣,懷不臣之意,又豈得為我漢之兵而自驕乎?臣逆慮哲人委棄,勢與晉侔,恐漢綱之不振矣!……」(頁 841)

作者酉陽野史在此總結十六國時期劉漢政權覆滅的原因,乃是在於在上位者的荒淫暴虐,並藉由諸葛宣於之口進行深刻的披露,顯見作者對劉漢政權所代表的「正統性」與「合法性」並不認同,與原著嘉靖本《三國志通俗演義》

宣揚的「仁德」思想若合符節。第一百二十回〈斬准滅漢亂平陽〉漢主劉燦因斬准謀亂被殺，死前對斬后月華說出「汝父子忘恩負義，意圖作歹，譖害二王，今又如此，朕命豈能保乎？朕雖遭於賊手，漢之臣宰肯又輕放賊也？」而斬后對曰：「逆子污吾名節，無父母君臣之禮，死罪難追，尚敢責吾！兵士可速擒下！」最後「斬明乃令將諸后妃盡皆捉出，一併殺之。劉聰並妃嬪大小皆被誅戮，殆無遺類。」諸葛宣於得知氣死，斬准自稱大漢天王，並挖掘漢陵，此時災異之象頻仍，「鬼哭之聲聞於深巷，遠近皆同，妖火達旦不滅，大煌千里，穀麥食之幾盡。」第一百二十一回〈劉曜石勒滅斬准〉，當群臣建議劉曜「繼承舊業，先建號而後討罪」，「劉曜從之，擇日即皇帝位於赤壁壘，議改年號」曰：

有從事司馬翟楷、魯憑上言曰：「近聞斬准謀滅劉氏，稱為統漢將軍，止留陛下與劉太常二人以存宗祀。若又稱漢，則是被其所統矣。且先日讖語有曰：『代漢之興，有兆堪徵。』兆即趙也。漢將亂生，而先帝以趙王封陛下，此非兆之堪徵也？今宜改為大趙天王，以應符讖而諱其統滅二字也。」劉曜聽言大喜，曰：「大丈夫建立，當以超出於眾，何肯為所統也？」下旨改漢為趙。（頁 934）

而劉曜手下將領亦言：「陛下英雄過於列祖，豪傑自立規模，何必區區循於舊轍？」作者西陽野史雖然對書中劉漢政權的合法性表達支持，但對荒淫暴虐的治民之道同樣表達厭棄之意，而在冗長的戰爭敘事中傳達對「仁德之治」的政治期待。

《西遊補》第九回〈秦檜百身難自贖 大聖一心歸穆王〉，藉由孫行者代理閻王審判奸臣秦檜，兩人的對話，凸顯作者董說（1620年～1686年）對忠／奸之辨的政治思考：

行者道：「宋皇帝也是真話，到了這個時節，布衣山谷，今日聞羽書，明日見廟報，那個不有青肝碧血之心？你的三公爵、萬石侯是誰的？五花綬、六柳門是誰的？千文院、百銷錦是誰的？不想上報國恩，一味伏奸包毒，使九重天子不能保一尺棟梁，還是忠呢，還是奸？」秦檜道：「臣雖愚劣，原有安保君王、宴寧天室之意。『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此是一時戲話，爺爺，不作准也罷了。」（頁 2376）

作者董說以一種遊戲的筆調，對奸臣秦檜予以嘲諷，也寓含明末遺民的悲憤意識，形成文本與歷史的「互文性」對話，敘述宋金和議之事，秦檜請宋高

宗更思三日，而這三日秦檜仍不得閒：

秦檜道：「犯鬼三日也沒得閒。吾入朝時，見宋陛下和議已決，甜蜜蜜的事體做得成了，出得朝門，隨即擺上家宴，在銅鳥樓中爲滅宋、扶金、興秦立業之賀，大醉一日。次日，家中大宴，心性秦的官兒，當日，伴奏著金人樂，弄個『飛花刀兒舞』，並不用宋家半件東西，說宋家半個字眼，又大醉一日。第三日，獨坐掃忠書室，大笑一日，到晚又醉。」（頁 2378）

《西遊補》與《後水滸傳》、《續金瓶梅》都對秦檜形象著墨頗多，三書對宋金和議投以關注，《後水滸傳》中的秦檜以宋金和議爲脅，要求高宗出兵剿滅楊么，《西遊補》中的秦檜則是「挾金人以自重」，在地府審判中各種加諸秦檜之身的刑罰更添作者歷史批判視野與諷刺戲謔之餘韻，而《續金瓶梅》則對秦檜通敵陷害岳飛，與高宗偏安江南的心態多所刻畫，充滿善惡果報的天理思想。

《金瓶梅詞話》的寫定者有意以西門慶與妻妾間的生活瑣事做爲敘事核心，欲藉由人物之間的情欲糾葛與偷情事件，隱喻人性貪婪、社會陰暗所衍生而來的種種「德色」問題，以「家國同構」的敘事框架投射出朝綱不振、貪官橫行的政治現實層面，其後的續書《續金瓶梅》則是採取轉世框架，開展對財色命題的延續討論，首先融合宗教話語進入小說敘事當中。在西湖釣叟的〈續金瓶梅集序〉即對小說勸善主題予以闡述：

《續金瓶梅》者，懲述者不達作者之意，遵今上聖明頒行《太上感應篇》，以《金瓶梅》爲之注腳，本陰陽鬼神以爲經，取聲色貨利以爲緯，大而君臣家國，細雨閨壺婢僕，兵火之離合，桑海之變遷，生死起滅，幻入風雲，因果禪宗，寓言褻昵，於是乎諧言而非蔓，理言而非腐，而其旨一歸之勸世。（註12）

值得一提的是地方，作者丁耀亢（1599年～1669年）較側重戰亂背景的書寫。如第二回〈欺主奴謀劫寡婦財 枉法贓賄累孤兒禍〉，敘述月娘因投寺躲避兵禍，遇普淨禪師拯救，兵退還家，進城後一片殘破景觀：

城門燒毀，塚口堆平。一堆堆白骨露屍骸，幾處處朱門成灰燼。三街六巷，不見親戚故舊往來；十室九空，那有雞犬人煙燈火！庭堂

〔註12〕〔清〕西湖釣叟：〈續金瓶梅集序〉，見高玉海：《古代小說續書序跋釋論》，頁128。